

## 第六章 湘潭三雄 心潮逐浪

如果歷史讓蔣介石再做一次選擇，恐怕他依然不會選擇武漢。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的武漢，時而風雲突變，時而血雨腥風。所有人們性格、意志、本能、智力、判斷等都在這裡交織著，各派在此爾虞我詐、相互角力，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打倒不了誰。政治局面如同一鍋濃濃的粥，根本無法清楚分辨交融的米水，一團亂麻，剪不斷、理更亂。

亂中取勝原本是有著驚人判斷時局本領的蔣介石的拿手好戲，但武漢的局勢他卻無把握取勝。這裡並非一般性有理智的亂，而是從政治到經濟都一塌糊塗，國民黨、共產黨，文人、武人、各類投機者，加上號稱「民國保姆」的蘇俄顧問們，各唱各的戲，各打各的鑼。民眾與資本家們也都一頭霧水，結果，糧食吃緊，食鹽吃緊，資本吃緊……

然而，毛澤東心中有數，他比蔣介石更習慣化壓力為動力。讓他痛苦是：掌權的共產黨領袖們與那幫蘇俄顧問怎麼就不明白，「利用農民和工人製造的混亂可以奪取政權」的道理呢？在毛澤東心中，此刻的國民黨就像是一間等著人去住的空房子，而共產黨人卻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勉強挪進了空房子，始終

沒有當空房子主人的決心。

毛澤東不甘心地在所有他能出席的會議上，反覆闡述關於土地革命的原則：用暴力沒收地主們的土地。

可該如何沒收？是沒收個人擁有的二十畝以上的土地？還是三十畝以上的土地？亦或是兩百畝以上的土地？人們爭論不休。究竟在什麼程度上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對這些具體的問題，有著非凡想像力的毛澤東並沒有拿出具體做法，只是提出：佃農不納租。他強調應先有事實，再用法律去承認。

可這時的他畢竟不是武漢政治圈中的決策者，在國民黨土地委員會中尚有鄧演達呼應，而在共產黨的有關會議上，他卻總是鶴立雞群。俄國顧問們也不認可他的思路，受共產國際操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雖然在私底下有支持他的，但在最終的政策制定上依舊摒棄他的思路，因為黨內老大陳獨秀的推論是：農民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是不可能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只有工人才是無產階級。

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反對老頭子的推論，但堅持認為，除了幾個大城市有工人，其他地方到哪裡找工人去啊？沒有工人，又怎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呢？

不過，心情蒼涼的毛澤東在四月裡除了家添麟兒外，還有兩件讓他高興的事，這兩件事讓這位幾乎是單打獨鬥的東方普魯士由衷地笑了。

第一件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名為《湖南農民革命（一）》，由漢口長江書店出版發行了。小冊子只是三十二開五十二頁的平裝本，文字上也有不少編輯的修改，但這卻是三十四歲的毛澤東之文章第一次變成單行本。

長江書店是共產黨辦的，毛澤民是總經理。現在無法確定，毛總經理是否賣力地推銷過哥哥的著作？反正當時廣州、成都、長沙、南昌、安慶、九江、重慶等地的書店都有這本小冊子銷售。

拿到書的毛澤東很是興奮。雖然封面與每頁的書口處均以「湖南農民革命」為題，但正文標題還是用了他自己的題目《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對作者的肯定。

他反覆翻看著，發現在書的十八頁與十九頁之間夾有一頁附錄：〈歷年至二月份各縣農協會員數量比較表〉，表中列有湖南五十七縣的區協數、鄉協數、會員成分、會員數量。這個統計表格是編者加進去的，毛澤東並不認為它有多大的科學性，因為他不是寫一篇科研論文，而是要反擊那些不了解農民運動卻又指手畫腳的人。因此無需嚴密的學科邏輯，需要的是充滿豪情與激情的辯論，提醒人們從本質上去發現，然後反省，再然後是找到方法。

在毛澤東的靈魂深處，飄盪著「實踐即認識」這一根深柢固的觀念，在他的全部知識中，中國農民的起義革命無不是把行動作為觀念的。從陳勝、吳廣到水泊梁山，再到闖王、太平天國等等，所以他要的是農民有組織地被動員起來。

拿著飄散著墨香的單行本，他對尚在坐月子的楊開慧開玩笑說：「潤蓮他們給這冊子定價

大洋壹角，我看是低估了我毛潤之的精神力量。」

楊開慧笑著問：「精神多少錢一斤？」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無價。等我見到潤蓮還要打他。」

楊開慧說：「你這個大哥總是要家長作風。潤蓮搞的《嚮導》發行一期就賣八萬本，很了不起。」

毛澤東點頭說：「他是個有算計頭腦的農民，可以雙手打算盤，我家裡的帳都是他算。一九二二年我派他和易禮容去安源搞經濟工作，他居然學我父親，搞了小股份合作社，還滿成功。」

毛澤東對這位弟弟是看好的。一年多以前，正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毛澤民奉命去上海，擔任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接替瞿秋白做《嚮導》週刊的發行，當時週刊的全部家底只有七十二塊銀元。可週刊每月都要在《申報》、《民國日報》上做廣告，僅這一項費用就是七十二元，中央每月部只撥付六十元，其餘一概不管，《嚮導》的發行量也只有一千多份。僅僅一年多，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民也華麗轉身，從農民變成了老闆。

此刻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這本小冊子會成為日後全黨領導農民鬥爭的綱領性文件，他更沒有想到，一個多月後，遙遠的莫斯科會轉載他的文章。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雜誌《共產國際》，用俄文和英文以「湖南的農民運動（報告）」為題，登載了他的論斷。雖然不是全文，但畢竟是毛澤東的聲音第一次在共產國際內有系統地出現。時

任執委會主席的布哈林甚至在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擴大會上公開讚揚這篇「旅行報告」，把毛澤東稱為「鼓動者」。

現在，上海與廣東的形勢已急轉直下，一連串的事情在發生：共產黨中央從上海移到武漢；前來指導中共五大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正在武漢忙碌；在國民黨中常委第六次擴大會上，鮑羅廷建議並形成決定，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移遷南京；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爆發了工人之間的激戰（當時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四一二」會成為宣告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的導火線）；蔣介石在南京建都，形成寧漢對峙；到達武漢的汪精衛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他全部職務，並下令通緝；蔣介石在南京則宣布徹底「清黨」，並通緝一百九十七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代表。毛澤東雖非魁首，卻也赫然出現在名單內。

毛澤東擔憂，黨的五大能否對時局做出正確的判斷？他擔心，共產黨在總的退讓觀念指導下，從依附蔣介石轉移到依附汪精衛了。汪精衛是毛澤東的上司，兩人曾一起共事，對這個人，毛澤東是比較了解的。別看他在高聲疾呼：「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可這位政治家是經不起風雨的，經濟上他要靠鮑羅廷，軍事上要靠唐生智、張發奎，任何一方出問題，他都將應聲倒下。他建立的國共聯席會議制度規定：重要政令一律由國共兩黨會議施行。太不現實。在毛澤東眼裡，這位廣東人已被事實證明了不是蔣介石的對手。

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崩潰了，廣東的黨組織也轉入了地下。毛澤東想到兩個弟弟，不知他們情況如何？

第二件讓毛澤東高興的事是：他牽掛的兩個弟弟竟然邂逅在一條從上海開往武漢的船上。

二十二歲的毛澤覃帶著已懷孕的第二位妻子、十七歲的周文楠離開已陷入白色恐怖的廣州，經上海去武漢找大哥。

毛澤覃比大哥毛澤東小十二歲，也屬蛇。十三歲那年從韶山到長沙一師附小讀書，從此便受大哥的教育，並加入共產黨。

一九二四年暑假，毛澤覃與比他大二十天的趙先桂在韶山結婚，新娘是毛順生親自為兒子挑選的。趙家經商，與毛家素有生意往來，趙先桂的姑姑嫁給了毛澤覃的七舅文玉瑞，而這位七舅和七舅母是大哥毛澤東的乾爹乾媽。趙先桂與毛澤覃都是被毛澤東帶到長沙讀書的，一年後，已是共產黨員的趙先桂被組織選中，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對小夫妻斷了聯繫。

趙先桂走後不久，毛澤覃愛上了十五歲的周文楠。周父多次作官，在長沙有一定聲望。周文楠的侄女是毛澤覃的學生，因家訪的緣故，毛澤覃認識了全身透著靈氣的周文楠，多次交談後，兩人互有好感。

一九二六年，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的毛澤覃寫信要周文楠來廣州完婚，毛澤東並未反對這樁婚事。在廣州時，周文楠常去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聽課。

從上海坐船到武漢需要四、五天時間。一路上，隨處可以聽到槍炮聲，毛澤覃細心地照顧身懷六甲的妻子。這天，他在甲板上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那個西服革履、派頭不小的中年

人，不正是二哥潤蓮嘛！他高鼻梁、長長的臉很像父親。

毛澤覃沒敢叫二哥的真名，而是輕輕喊了他一貫的化名——楊杰。

正在思考問題的毛澤民聽有人叫，回頭一看，竟是自己的弟弟毛澤覃，急切地問：「潤菊，你怎麼會在這裡？」

毛澤覃小聲告訴他是去武漢找大哥的，並把周文楠介紹給他。毛澤民為弟弟要做父親了而高興，說：「潤菊，大嫂前些天也可能生了孩子，她有經驗，讓三妹跟著大嫂，包準沒問題。」

兄弟倆輕聲交換情況，毛澤覃得知二哥「四一二」在上海差點被抓，嚇出一身汗。

毛澤民說：「看來情況很複雜，見了大哥再說，不知能不能討論出一個辦法來。」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麼，拉毛澤覃來到他的艙房，指著一位年輕的女人說：「這是你二嫂，跟你同歲，浙江諸暨人。」

毛澤覃愣了一下，繼而笑著叫了聲：「二嫂。」剎那間，他意識到怎麼兄弟三個都討了第二個老婆。

大哥十四歲時尊父命取了湘潭楊林鄉的羅氏，那個女人比毛澤東大四歲多。他們結婚三年，大哥一直不喜歡她，在大哥離開韶山那年，她病死了。後來大哥才又找了開慧嫂子。

自己也是先娶趙先桂，續娶周文楠。

現在二哥一樣，也續娶了。二哥原配王淑蘭是個小腳女人，很能幹，上屋場的家事都是她在做。她也是父親毛順生安排的，為毛家生了三男二女，可惜只活了一個。面前的這個二嫂一看

就比以前的二嫂有文化。

「她叫錢希鈞，也是我工作上的助手。」毛澤民介紹說。原來，一年多前他去上海工作，組織安排上海楊浦怡和紗廠工會會長鐵希鈞做他的假妻子，這是為了掩護秘密工作的需要。不久，兩人彼此吸引，弄假成真。

當毛澤民、毛澤覃兩兄弟與周文楠、錢希鈞兩妯娌同時出現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時，一直為他們擔心的毛澤東走上來連連打著毛澤民說：「上海已經發生那麼嚴重的情況，沒得你半點消息，急死人囉。」

毛澤民不明白大哥為什麼高興了和不高興了都愛打他，他並不知這其實是毛澤東戀母情結的體現。八歲之前，毛澤東都是在外婆家度過的，缺少母愛。而離開母親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民出生，這使他潛意識裡有點抵制二弟。

楊開慧見狀連忙說：「莫打了，這不是你毛家祠堂。」

毛澤東樂了，說：「我這是高興啊。你們回來了，回了就好哇！」

毛澤民與毛澤覃分別描述了「四一二」上海和廣州的情況。毛澤民並不很了解具體情況，只知道上海總工會被打散後，上海的黨組織亂了，找不到人了，他自己也被包打聽抓住，幸好用錢進行疏通。廣州的情況也一樣，李濟深對共產黨有看法，在那裡黨的工作已無法進行下去，黃埔軍校也開始殺共產黨員。

毛澤東若有所思地告訴弟弟們，山雨欲來風滿樓。他說：「我們總是強調要在工人階級中

領導革命，冒錯囉，但這是俄國的經驗，中國不是俄國，你們看看，有幾個產業工人？遍地都是農民。農民能幹什麼？農民只能做洪秀全、李秀成。」他停了一下問毛澤覃：「潤菊，你有什麼打算？」

毛澤覃說：「我還是想做軍隊的工作，文楠就留在你這裡。」

楊開慧連忙說：「可以可以，讓三妹給我做伴。潤之，鄧演達那裡不是正缺人嗎？三弟又在黃埔軍校做過。」

毛澤東點點頭說：「我來安排。爭取去第四軍工作。」他又問毛澤民：「你呢？」

毛澤民說：「我和錢希鈞是奉命來漢口《民國日報》社工作的，要我做總經理。」

毛澤東嚴肅地說：「好。雖說它是國民黨湖北黨部的機關報，但也是共產黨的一塊宣傳陣地呀。」他用欣賞的口氣說：「上海的黨報刊發行你做得很好，可以雙手打算盤的人必定帳算得好。你動過盲腸手術，現在情況怎麼樣？」

鐵希鈞在一邊說：「他的刀口癒合不好，都幾年了，經常疼痛。」

毛澤東關心地看看二弟，輕聲說：「潤蓮吶，身體也是革命的本錢。這個帳，也要算啊。」

見到了兩位弟弟，毛澤東那顆一直懸著的心放了下來。潤蓮的經營工作已能獨當一面，這是革命急需的，期待潤蓮可以積累更多經驗。潤菊且已結了兩次婚，也馬上是要做爸爸的人，可還是個孩子，需要歷練，往軍隊中發展，這路子是對的。在長期的思考中，毛澤東對槍桿子的認

識逐漸成熟。要革命，沒有軍隊就是空談。幾年來的東征、北伐有一批共產黨員變成了軍隊領導人，潤菊加入其中有百益。

如此一來，毛澤東兄弟三人分別在政治、經濟、軍事三大領域錘煉，總有一天可以互補。在毛澤東看來，到那個時候，一切都可以順理成章。

四月十九日下午，毛澤東參加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類似的會議已參加多次。儘管絕大多數是紙上談兵，但他還是希望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內形成綱領性的文件，他認為發動和領導農民革命刻不容緩，汪精衛手上的王牌不應該是唐生智、張發奎，而應該是千千萬萬的農民，否則他繼續北伐以及與蔣介石抗衡就是空中樓閣。

對政治和時局極其敏感的毛澤東，雖強烈感覺到了來自上海、南京、廣州的「寒風」，但由於他並不在風暴中心，甚至也不在武漢各方的決策層裡，許多事只知道蛛絲馬跡，大多是從報紙上得到的。此時，汪精衛等人提出繼續北伐，這能抵禦蔣介石颯起的「寒風」嗎？他持觀望態度。

武漢對是否出征北伐問題分為兩大派：鮑羅廷看好在中原起事的馮玉祥，在老毛子眼裡，西北軍絕對是一支抗擊蔣的有生力量。讓汪精衛的北伐與西北軍聯手，可生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並可能被共產黨所控制；但鄧演達清楚地看到，武漢政府目前要對抗的不是張作霖的北京政府，而是正在積極另立中央的蔣介石。應該把手中的全部隊伍從北伐變為東征，只要高舉討伐蔣介石

的大旗，雖然兵弱一些，卻有可能使得程潛等其他北伐軍掉轉槍口，跟蔣介石對著幹。

無論從公從私，毛澤東都是支持鄧演達的，但他的支持僅僅是道義上的。當武漢政府最終決定北伐時，他向鄧演達獻了一計：在直、魯、豫三省盡快成立農民協會，協助北伐。

在擴大會上，毛澤東遇到了從湖南來武漢參加中華全國農協成立大會的易禮容。他是由毛澤東介紹入黨的，兩人也是老搭檔。當年湖南只有三個共產黨員時，他排在毛澤東、何叔衡之後。

與易禮容交換了兩個月來的湖南農民運動情況，又思考了毛澤民、毛澤覃帶回的信息後，毛澤東抓緊時間在會上連續發言。

他聲線尖細，幾乎每次發言都是條地站起來，操著有濃重湘潭口音的語言，開始滔滔不絕。他手夾香菸，在屋子裡遊走者，不時猛吸幾口，時而語速加快，時而語速平緩。他不用稿子，但發言卻極具邏輯性，又鋒芒畢露。他不時用餘光掃視四周，很在意別人是否能聽懂。

「政權問題不過是形式的問題，我們只要切實實現本黨的決議已經夠了，擴大農民協會的組織，則農民的政權是不成問題的……」

他順著這個話題往下說：「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我看有三條：第一，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實為本題的主要意義。第二，土地問題不解決，經濟落後的國家不能增加生產力，不能解決農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故第二個意義為增加生產。第三，保護革命。革命勢力目前雖見發展，但亦到了一個危機。此後非有一支生力軍，否則必歸失敗。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

毛澤東想到第三個意義的時間就在當天上午，武漢政府在武昌舉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師典禮。汪精衛在會上慷慨激昂地說了北伐的三個目的：「把革命的勢力擴充到北京，統一全中國……是我們此次北伐的第一個目的；我們要使全國民眾能得到解放，必須要打倒奉系軍閥，這是第二個目的；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尤必須要打倒本黨的內奸蔣介石，這是北伐的第三個目的。」

毛澤東並不知道，李宗仁此前派他的參謀長王應榆到了武漢，提出：「雙方均承認既成事實，大家分道北伐。待會師北京，再開會和平解決黨內糾紛。」正是有了這個前提，汪精衛、鮑羅廷又堅信被蘇俄武裝的馮玉祥一定會站在武漢這一邊，所以才不顧一切揮師北伐。汪精衛何嘗不想有蔣介石那樣的光環。

會議主席鄧演達在會上發表關於農民政權問題應分三步走，即先討論鄉、區、縣自治機關組織法；再使農民得到武裝；最後制定相關法令並公布。聽到這裡，毛澤東再次站起來說：「我很贊成鄧主席的意思。我個人以為，國民政府農政部應即設鄉村自治委員會，專門管理鄉村自治機關的事項。由此，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可再加三項：廢除封建制、發展中國工業和提高文化。」

會議很晚才結束。會議決定由毛澤東、譚平山、顧孟餘起草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文件，並決定自次日起，每天召開擴大會議。但毛澤東明白，農民問題只有跟革命聯繫在一起，才可能得到解決。

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後的第八天，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毛澤東仔細讀了這個宣言。

毛澤東注意到〈宣言〉用了很大篇幅講農民與革命的關係：「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若不經過農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義政權是不能夠建設的……在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各省，農民運動如野火一般散布起來。如果國民政府能根本改革農民數千年來所受之奴隸境遇與痛苦，國民革命就有真正的保障。」宣言中還明確地指出：「農民革命是與國民革命不可分開的。」

這個宣言，除了在農民問題上的描述與毛澤東的思想同步外，絲毫看不出遭受如此重創的共產黨有悲壯的情感，似乎在說別人的事。宣言中關於支持國民黨開除蔣介石黨籍，罷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類的語言，在毛澤東看來是那麼地軟弱。他不解，既然黨內同志知道農民革命的重要性，為何不徹底地在農民問題上開出一條路子？

毛澤東想起四月五日陳獨秀與汪精衛發表的那個聯合宣言。現在看來，他們在十幾天前已經發現了蔣介石的苗頭，但為什麼沒有進一步行動？上海不是被總工會占領了嗎？武漢不是承認了上海市民大會嗎？蔣介石不是表態，所有軍政、民政、財政都須在汪精衛指揮之下嗎？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上海為什麼沒有變成武漢？

那份陳獨秀與汪精衛發表的聯合宣言，一看便知是出自孤傲的陳獨秀之手，雖一氣呵成，卻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宣言中說：「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

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是一定死板地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的問題，即將來也不至發生。」

誰會信這一紙空文？你陳獨秀不說，人家恐怕還沒想到，你大肆一說，便把原本就脆弱的合作炸開了一個口子。宣言還說什麼：「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誰是強大的敵人？既然是強大的敵人，他會在乎你這種無病呻吟般的喊叫？毛澤東無法知道這個宣言是否也是鮑羅廷等的意思，但他猜測，上海所發生的一切很可能跟這則宣言有關。蔣介石在上一年的一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中已將多疑且冷酷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怎麼會信這則跟他有關，卻不是他簽署的宣言呢？

一年前，毛澤東在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時，開篇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共產黨人分清楚敵我了嗎？

毛澤東仔細梳理「四一二事件」後，武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反應，感覺兩黨似乎產生了共性：蔣介石的人在上海把武裝工人糾察隊繳械了，死了人。但並沒有人對這個事件做出嚴肅認真的評估，也沒有具體的有效行動，只是傳來汪精衛幾聲「簡直是反了」的咆哮。

毛澤東本人在「四一二」後的一週裡，一直在參加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的會議，同時與鄧演達等聯手，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準備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一切都在按部就班中平靜地進行。

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公開通緝一百九十三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時，大家才如夢初醒，終於看清了蔣介石在上海屠殺背後隱藏著更大的陰謀。到這時，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才宣布處理蔣介石；宋慶齡、鄧演達等國民黨中執監委、候補執監委聯名通電討蔣，毛澤東也在那份通電上簽了字；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發表了相關宣言，譴責蔣介石是民族叛徒、帝國主義的工具；共產黨也發表了相關宣言；武漢三十萬群眾集聚武昌閱馬場舉行了討蔣大會。

可一切都晚了，寧漢對立已成事實。而且李濟深在廣東舉起了武力「清黨」的屠刀，浙江、安徽、福建也倒向南京，江西的朱培德正在搖擺。這些資訊讓毛澤東愈發地徬徨起來。雖然眼下武漢是安全的，但能安全多久呢？如今衛戍武漢的大部隊都去二次北伐了，而從南京到武漢不過幾天工夫，蔣介石的下一步是什麼？南京雖也開始了二次北伐，但此人是不會不盯住武漢的。

這天，憂慮中的毛澤東與來都府堤四十一號做客的蔡和森交談，兩人用湘鄉話聊著。

毛澤東自嘲地說：「我們都上了蔣某人的黑名單啦，你怕不怕呀？」

蔡和森笑著說：「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自上海坐郵船去法國那天起，就不知道什麼叫怕了。」

毛澤東點頭說：「我們確實不知道啥叫怕了，但不管怎樣，你還是要注意哮喘病啊。」

蔡和森搖頭說：「自幼得的病，要注意也晚了。向警予就對我這個病一直耿耿於懷。」

毛澤東問：「她在武漢總工會工作還好吧？」

蔡和森搖搖頭說：「具體情況不詳，沒聯繫。」

家庭話題原本就不是毛澤東想談的，他是要與這位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交流彼此對局勢的看法。蔡和森從蘇俄回來途經長沙時，對農民運動有這樣的評價：「現在革命的發展，第一當注重的是農運問題。」「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跟思想一致的人談話，毛澤東就如同酒逢知己。而對中共中央核心層動態了解不多的他，更希望從好友身上得到他需要的信息。

「那個印度人羅易忙得很嘛。」毛澤東拋磚。

蔡和森也正煩惱，說：「毛子之間也矛盾。二次北伐的問題，老鮑與羅易就針鋒相對。老鮑想利用二次北伐在西北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把希望押在馮玉祥身上，建議蘇俄給馮很多支持。仲甫向老鮑建議，從蘇俄給馮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來武裝共產黨掌握的軍隊，可老鮑拒絕了。而羅易堅決反對二次北伐，說是軍事冒險是武漢政府轉移群眾視線、擺脫群眾影響的陰謀，但史達林站在老鮑一邊。結果政治局正式反對二次北伐的決議僅過了兩天就變了，做出了相反的決議。唉，這就叫朝令夕改呦！」

毛澤東憂鬱地說：「我看這些老毛子策略有問題，太過倚重國民黨、輕視共產黨了，他們之間出現的問題影響到了許多工作。那個羅易堅持認為二次北伐與一次北伐的目標不同，批評二次北伐不是為了打倒北洋軍閥、推翻北京政府，而僅僅是去把馮玉祥從陝西接到河南。老鮑一直就沒同意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意見，他說現時談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幻想，他的主張就是抓住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放。」

蔡和森冷笑說：「老鮑這幾天還得意地說：我的箱子裡還有草（指蘇俄援助），他唐生智要吃我的草，還不至於跑掉。他難道不知道《農夫與蛇》的故事嗎？」

毛澤東說：「現在看來，羅易雖是共產國際首席代表，卻因手上沒掌握援助中國的棍子，說話遠沒有僅是國民政府顧問的老鮑香啊。」

蔡和森點頭說：「是啊，老鮑是核心人物。去年仲甫派彭述之去廣州，想說服老鮑放棄對蔣介石的資助。但老鮑不同意。結果斷了彭述之的零用錢，聽說連買香菸的錢都沒了。」

毛澤東樂了，這個彭述之就應該這樣治他。但瞬間又灰心起來，鮑羅廷的統一戰線與羅易的土地革命已經針尖對麥芒了。月初羅易到來時，大有改組中共中央的意思，可陳獨秀一到武漢，情況似乎又發生了變化，即將要召開的中共五大會是什麼樣子？

蔡和森也擔心五大的走向，他是共產國際為了加強對中國革命的領導而被派回來的，可現在每次會議，羅易都是大發一番議論，老鮑接著反駁，然後仲甫、秋白等人捲入爭辯。往往為一個小問題爭辯許久，而做決定卻只用幾分鐘。他告訴毛澤東：「羅易提出的原則都是對的，可他只有原則沒有辦法，結果開會變成了上課，空洞的理論一大套。依我看，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羅易剛好相反。」

毛澤東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說：「我看老鮑是站在仲甫右邊一點點，而羅易則站在老鮑和仲甫的左邊一點點。遺憾的是他只是站著。」他突然想到毛澤民提醒的一個問題，說：「潤寰，你注意到十七號發布的《集中現金條例》沒有？所有收付銀兩都改用紙幣，漢口的銀行也都用紙

幣結算呀。」

蔡和森搖頭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了解情況，聽說發紙幣的主張是宋子文提出的。現在武漢工人向老闆提出的要求過高，勞資糾紛不斷，導致財政狀況似乎很不穩定。」

毛澤東說：「如果貨幣不能自由流通，商品就不能流通，那麼經濟就會崩潰。宋子文說去上海籌錢，也不知是否籌到？我看這國民黨愈來愈像一支軍隊，而不像政府囉。」

毛澤東不知道，武漢經濟領域的靈魂人物宋子文對武漢的經濟已經無能為力了。他去上海籌錢，誰知蔣介石搶先一步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開展工作，讓他這個「和尚」沒了「廟宇」。加之大姊宋霽齡不厭其煩地勸說，以及蔣介石的威脅，他只得躲在上海等待在黃埔江畔迎接汪精衛。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蔡和森與毛澤東此時都不知道。在遙遠的莫斯科，兩位共產黨巨頭正在角力。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在列寧去世後，便沒有停止過奪權的明爭暗鬥。史達林通過蘇俄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托洛茨基則通過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國共產黨革命。托洛茨基在中國的代表羅易極力推動，要將史達林的代表鮑羅廷納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只有這樣，首席代表羅易才能指揮鮑羅廷，但因史達林反對這個做法而不了了之，而中國共產黨又擴散在國民黨內。

沒有誰明白，該怎麼辦？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開幕。毛澤東作為候補代表，參加了大會。此時的中共黨員已從四大的九百九十四人，急速擴大到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三人。

四月二十七日（很可能是二十八日，在羅易後來的一個報告中明確提到是二十八日。參加會議的翟秋白、楊之華夫婦在會場留影，照片上標明：四月二十八日，最可紀念的一日），毛澤東仍然是灰布長衫走出了都府堤四十一號，往左拐不遠便是中共五大的會場都府堤二十號。

這是一個由灰色建築圍起的院子，穿過高大的西式院廳，裡面是一片清末民初風格的建築。這是國立武昌高等師範第一附屬小學的校園，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在這裡工作居住（十六年後，他與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在新疆同時被軍閥盛世才殺害）。毛澤東發現，院子的周圍有不少國軍革命的戰士，他思忖著，共產黨開會也享受被保衛的待遇了。

一走進院子，他就看見許多熟悉的面孔：陳獨秀、李立三、陳延年、李維漢、劉少奇、譚代英、張國燾等。還有不少洋人，除了共產國際代表，英、法、美、德等國共產黨代表也來了。在鬧哄哄的人群中，還有代表國民黨來祝賀會談的徐謙、譚延闓和孫中山的長子孫科。

在簡單寒暄中，毛澤東得知不少同志是從上海搭乘英商怡和公司同一條船秘密趕赴武漢的，單程船票統艙也要四十五塊銀元。他們化裝成生意人、水果販子、茶葉販子、做盜器的，直到輪船過了九江，那些蒙被而臥的人才大膽走上甲板高談闊論起來。讓人驚訝的是，有相當一些人對離開上海都戀戀不捨，難道那裡的形勢還不夠嚴峻？

對於這次會議，毛澤東心中已不抱什麼希望。雖然是候補代表，但他還是有備而來。他在

會場裡的一條凳上坐下，接著發現，主席台上未見鮑羅廷的身影，這加深了毛澤東的疑問。

更讓毛澤東不解的是，在羅章龍提出的主席團名單中，支持陳獨秀的人均不見蹤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當場站起來抗議，提出彭述之、羅亦農應該參加主席團。後來毛澤東才聽說會議的操控者們採取了「清君側」的策略。

開幕式上，毛澤東注意到兩個細節：一是國民黨嘉賓譚延闓雙目微閉，一言未發；二是開幕式後有人提議，說這是建黨七年來第一次公開的大會，出席大會的八十人代表全國五萬七千多黨員，應攝影留念，但未得到組織者的同意。

開幕式後，毛澤東的種種疑問開始一點一點變為失望。這次大會的代表確認議題、議程、決議以及誰當主持人，全部由共產國際事前規定，連會議的政治報告大綱也是羅易規定的。偏偏陳獨秀在會上依舊是家長作風，動不動便對年輕的共產黨員說：「小孩子，懂什麼。」毛澤東獨自冷笑：「你陳仲甫如今不過是拿著湯匙的丫頭而已囉！」

完全讓毛澤東不解的還有，這次大會居然是為了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的會議，可第七次擴大全會是在上年末召開的，半年來中國已發生了劇烈變化。之前蘇俄《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志。」史達林也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可現在人家已在南京另立政府，公開與蘇俄決裂了，難道這次大會不應該根據新的局勢做出新的決議嗎？共產國際卻要求中共五大一切政治決議要完全以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在毛澤東看來，這不是運籌帷幄，而是紙上談兵。

五大——這次半公開的大會前後進行了十三天，在武昌只舉行了開幕式，便將會場轉移到漢口濟生三馬路黃陂會館。理由有二：漢口較武昌更為安全；大多數代表住在漢口，坐渡輪過江不方便。毛澤東住武昌，也是少數代表，只能趕渡輪去漢口開會。因為對大會的失望，他並沒有全程參加大會。

黃陂會館大門前是一條新開的寬馬路，順著院子裡一條長長的石子路，可直進大廳。會館正廳是開會的地方，主席台用學校的講台搭起，台下排列的椅子一直到牆根兒。

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一進會場，就發現條凳上放著一本題為《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是瞿秋白寫的。毛澤東翻著書，耐著性子聽完了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做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涉及國共兩黨關係、軍事、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十一個問題，足足講了六個小時。報告以全蓋偏，並沒有根據當前的現實指出方向。毛澤東強烈地感受到，他的這位革命導師是在羅易與鮑羅廷兩個洋人之間徘徊，可這樣會貽誤時機啊！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又聽了羅易代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所做的長篇講話，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分為五個大問題：第一，進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裝農民，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第三，組織農村自治政府，摧毀農村封建地主的政權；第四，建立國家機構，進而實現民主專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軍隊，不是採取把軍閥軍隊變成革命軍隊的辦法，而是在鞏固社會的基礎上組織一支革命軍隊。

在毛澤東看來，羅易的報告更具鼓動性，給了代表們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但是該如何操作呢？這張美好藍圖如何變為現實呢？看來蔡和森對此人「有原則而無辦法」的評價是恰當的。

羅易在報告中不點名地批評了陳獨秀支持二次北伐，可武漢的北伐軍已經出發，聽說打得還不錯。他還批評陳獨秀的「革命的下一個時期是低落時期」的觀點，大聲叫道：「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個時期將是發展時期。」讓毛澤東覺得可笑的是，羅易為了彌補共產國際決議在前、蔣介石「清黨」在後的矛盾，把蔣介石的分共說成是好事，說如此一來，反而減少了「矛盾」，統一戰線更「單純」、更有利於革命的「進攻」了。

毛澤東認識到，共產黨好像在被國民黨同化，馬克思主義似乎被悄悄地換上了三民主義，並且出現了如國民黨常用的名稱「常委」。更讓人驚奇的是，五大的宣言居然是用英文寫成的。

其實這時中央內部的角力已經白熱化了，角力改為主要是羅易對鮑羅廷、陳獨秀。鮑羅廷認為，當下要建立穩固的基地是幻想，如果支持農民徹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反對國民政府，因此也必然導致武裝暴動，這將很危險。最佳辦法是讓北伐打成一鍋粥，沒有勝利者，那時中國將成為「無主之國」，再施展共產主義策略會極有效。

而羅易不這麼認為。他主張東征，先拿下蘇、浙、贛、皖連同兩湖，形成一片穩固的基地，從而開展土地革命。

雙方分歧的焦點是：「深入革命」還是「擴大革命」？結果因為陳獨秀的支持，鮑羅廷贏了，黨一直強調的土地革命變成了一種欺騙。不過羅易這位四十歲、戴著寬邊眼鏡的印度人倒是讓毛

澤東看到了些許希望。不管怎麼說，他的論斷深深地印在了毛澤東腦海中。

當然，誰也不會知道，僅僅過了兩年，眼前這位極左的共產黨員會因為批評共產國際極左而被共產國際開除，與共產黨決裂了。

在接下來的大會討論中，瞿秋白批評了彭述之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這是在解釋發給代表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但他還是維護了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沒有點名批評。

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都說明，能領導革命進行到底並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這也是不點名地批評陳獨秀把革命勝利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身上。

會議期間發生的一件事，讓毛澤東強烈感受到「聯合戰線高於一切」的力量。那天會議通知：明日邀請汪精衛來大會演說。根據會議主席陳獨秀的指示，大會秘書長蔡和森帶著一幫人忙開了，先是撤換了牆上的標語，把「工農小資產階級同盟萬歲」、「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反對白色恐怖」等換成「國共合作，革命必勝」之類的標語，然後把主席台上馬克思、列寧的碳精畫像做了調整，在兩幅畫像中間加了一幅稍大一點的孫中山畫像，並且掛得略高於馬列二人。

次日，當汪精衛在衛兵的護衛下來到會場時，穿著一身簇新中山裝的瞿秋白滿面笑容把這位國民黨領袖迎到台上。

對汪精衛的認識，桂系李宗仁似乎比毛澤東更為細膩。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汪兆銘的為人，堂堂一表，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其真正的個性，

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欲極強……每臨大事，復舉棋不穩，心志不定……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捶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暱。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

汪精衛的演講果然充滿熱情，他琅琅地闡述著他的革命理論，指出國民革命唯一的目標便是反對帝國主義，至於階級鬥爭、土地革命都不是現在應該進行的。他認為是民族主義使革命陣營團結，而社會革命必然引起分裂。他同時表示，雖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只能在占領北京之後實行。

對毛澤東更大的打擊是，陳獨秀居然把他精心準備的一個提議扔在一邊，甚至不讓大會討論。這個提議是「解決農民急需解決的土地問題，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在寫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多次參加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討論，並且與彭湃、方志敏等人充分討論後形成的東西，可大會根本就沒當一回事，這讓他萬分沮喪，強烈感到被羞辱。

因為毛澤東沒有表決權，所以剩下的會議他沒有再參加，但他並不清楚，提議被冷落的根本原因不是陳獨秀看不起他，而是不合共產國際的胃口。遠在蘇俄的共產國際平均兩天半便會對中國革命問題作出決議，甚至包括如何與國民黨談話、要注意什麼，都有具體指示，俄國人甚至覺得國民黨更為可靠。

沒理會五大的毛澤東，在五月五日和六日參加了國民黨的活動。五日他以全國農協代表身分出席一個歡送會，歡送由他提議四月二十九日成立的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及農講所部分學員前往河南，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常委。

六日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最後一次擴大會議。在這天的會上，他見到了陳獨秀和鮑羅廷。他已不在乎強權，而是繼續重申他對沒收土地的意見，並反駁了譚延闓提出的以「逆產處分委員會」的名義分配土地的意見。

打擊一個接著一個，從上海開始的屠殺正在長江以南蔓延，而北京又傳來李大釗被張作霖政府判處死刑、被絞殺的消息。

心情鬱悶的毛澤東躑躅在長江邊上。李守常（李大釗）的犧牲，讓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難忘歲月……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歲的毛澤東為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走出三湘大地到了北京。他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九號（現為十五號），這是恩師、北大教授楊昌濟的家。正是在這裡，他愛上了楊教授十七歲的千金楊開慧。這年夏天才隨父親從長沙遷到北京的楊開慧，對「毛潤之」的名字耳熟能詳，父親常常在家提起這位得意門生。這對年齡相差八歲的青年，操著家鄉話興奮地聊著。兩人常常出門往北，過鼓樓沿景山東街到紫禁城外筒子河邊，北海堤垂柳下都留下他們的身影。

兩個月後，楊教授給了高徒毛澤東一個驚喜，介紹他認識北大圖書館李大釗。又經厚道的李大釗向校長蔡元培推薦，只有中學學歷的毛澤東被安排進了位於紫禁城東北一點的沙灘北大紅樓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第二閱覽室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八塊銀元。

雖然毛澤東知道李大釗的薪水是一百二十元，但他非常滿意這份工作和這份薪水。在偌大的北京，終於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他也因此搬到景山東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東夾道七號（現為吉安所左巷八號）。在三間小屋裡，擠進了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八人，幾個人同蓋一床被。從這裡去紅樓圖書館上班，鑽胡同走也不過八百米的距離。

在這座有地下室的四層工字形紅磚樓裡，毛澤東見到了當時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精英，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錢玄同、張申府、周作人、傅斯年、張國燾、鄧中夏等人。雖然他們對這個湖南人並不怎麼搭理，可他們之間的對話，足以讓這個第一次走出湘境的年輕人耳濡目染、眼界大開。地處皇城根的紅樓已然是新思想運動中心，而在知識分子中有極大影響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等雜誌就是在這裡編輯完成，傳播到全國的。在他們的影響和鼓動下，毛澤東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思想，由信仰無政府主義開始轉而信仰共產主義。他不但加入了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的新聞學研究會，還加入了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組織的哲學研究會。

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戰勝同盟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中國成為戰勝國。二十七日，毛澤東在《北大日刊》上看到一則啟示：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為慶祝協約國戰勝日

期，本校擬於每日下午開演說大會（地點在中央公園）……

毛澤東去離紅樓兩公里外的現場聆聽了闊步登台的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演講，聽著這位只比自己大四歲的河北人那高亢的聲音，以及絲絲入扣的全新觀念，毛澤東激動不已。

「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而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部分人慶祝，而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

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第一，須知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懷孕的勞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第二，須知這種潮流，是只能迎，而不可拒的……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第三，須知此次平和會議中，斷不許……陰謀政治家在那裡發言……第四，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世界……

精闢的論述、深刻的揭露，讓毛澤東醍醐灌頂、耳目一新，這為他八個月後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提供了範例。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與李大釗的文風惺惺相惜。

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五個多月裡，毛澤東除了有機會與李大釗等交談外，還閱讀了大量來

自國外的革命書刊，對政治的興趣愈來愈大，思想也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馳騁，他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華夏的第一步。

有文獻說，在北大也有一件事讓他終身難忘。一次，因為字跡十分潦草，誰以辨識，把北大學生會領袖傅斯年要借的一本書搞錯了，毛澤東不認錯，反而強辯。毛的湘潭話與傅帶天津口音的山東話無法溝通，傅斯年氣急之下打了毛一個耳光。這段軼聞不知是真還是假，可以知道的是敢發飆把「蔣家王朝」兩任「行政院長」趕下台的傅斯年，卻不敢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誕生。而毛澤東則在離開北大三十二年後，依舊用他獨特的書法為北京大學題寫了校名。

這段圖書館的工作經歷，還使毛澤東在二十年後遇到一個比他小二十一歲的女人時有了共同的語言。這個女人便是他第四任夫人——江青，她曾用「李雲鶴」的名字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過九個月。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又一次來到北京。熱情的李大釗向他推薦了許多革命書籍，其中考茨基的《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了毛澤東心中，他開始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一九二一年，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南北建黨之後，在南方的毛澤東自然與陳獨秀接觸更多一些，又因其主編的《新青年》，以及陳教授放達不羈的作風，讓毛澤東狂熱地迷戀。他完全同意「革命的道路」應該像陳仲甫所說要講究「過程」，而不應該像李守常那樣太注重強力的「意

志」。他徹底拋棄了「康梁」，轉而對陳獨秀、胡適等崇拜。

李大釗的共產黨北方支部似乎從一開始就是獨立的，與南方中共組織交叉不多。記得和李守常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國民黨一大上，李是國共合作的推動者。毛澤東從沒忘記這位好人，在擔任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還特意委託人去找李大釗，請其在北京、天津選拔學員。現在李守常死了，是被絞刑架三絞而死的，死得很慘。

四月六日清晨，京師警察廳在北京東交民巷蘇俄使館內抓住了李大釗。同時被逮捕的還有二十二名蘇俄人和三十六名躲藏在使館內的國共兩黨黨員，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九名執行委員中有六人被抓。只過了二十二天，在未開庭判決的情況下便被絞殺。

京師警察廳敢闖入蘇俄使館一定是非正常行為，背後有陰謀。張作霖不但殺了李大釗，還公布了在使館搜到的多份機密文件，包括蔣介石、馮玉祥向蘇俄借款的契約，以及蘇俄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而南京方面發布的通緝一百九十七人名單中並沒有李大釗。

李守常是五大開幕第二天被絞殺的，年僅二十八歲。這一切都預示著什麼？毛澤東心痛，李大釗的頭顱在組織中的分量是何等的重啊，他的「革命意志」學說，如今已開始悄悄地改變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該怎麼走的思維。

羅易在五大上說：「在現階段，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組織有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參加的革命聯盟，建立民主專政，領導中國革命走非資本主義道路，並把國民革命轉變為爭取社會主義

的一場鬥爭。」

毛澤東想，所謂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大概就是指中國革命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吧。但不經過民主主義社會，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嗎？陳獨秀一定是懷疑的。因為即使實行最徹底的土地革命，恐怕也難完成羅易的目標，但如果採用另一種方式，如李大釗所說的「革命意志」即暴力革命呢？

心情蒼涼不知如何是好的毛澤東登上了長江邊蛇山上的一座三層飛檐、大有楚地古閣樓建築風格的樓宇，周邊的人們都把這座名為「奧略樓」的古建築稱為「黃鶴樓」。

看著飛檐下高懸的匾額「南維高拱」，和大柱上「大江東去」、「爽氣西來」的對聯，毛澤東將煩惱、徬徨與憤怒轉變成了詞句，他要把所有的志向都鑲嵌詞境之中。

毛澤東是知道黃鶴樓的，它乃武昌名勝，俯臨大江，氣象雄壯，此樓因崔顥的詩作而名聲大震。毛澤東脫口而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沉浸在詩意中的毛澤東，想起一段關於李白到黃鶴樓看見崔顥詩後的軼聞，說李白想不出比崔顥更絕的句子，便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毛澤東心道，李謫仙不敢題詩，我毛潤之敢嗎？

登高眺望，八面來風，兩岸景象盡收眼底，滾滾長江奔騰向東。多少天來的煩悶，在這開闊的視野中化作了抒發意志的詞句。他用詞調中最古老的【菩薩蠻】曲調，八句從他的嘴中慢慢

吟出：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酌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強烈感覺到革命導師陳獨秀在黨內被排擠。雖然對陳獨秀的做法有意見和不解、無奈，但在他心裡，「革命」還是與「陳獨秀」畫著等號。他把「革命」與「陳獨秀」化成了詞中的「黃鶴」。

藉景抒情的毛澤東此時缺少了「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浪漫，也沒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但卻多了一份成熟和悲壯，多了一份感慨與思考。

回到都府堤四十一號，他立刻揮毫寫下：〈調寄菩薩蠻·登黃鶴樓〉。

當時的毛澤東並不知道，在四十三年前（一八八四年）一場意外的民房失火殃及了清代同

治七年（一八六八年）重修的黃鶴樓，一夜之間，大火使黃鶴樓蕩然無存。

而毛澤東登上的那座奧略樓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張之洞從湖廣總督任上升任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後，他的門生和下級為紀念他，集資在黃鶴樓遺址附近建造了這座樓，原名「風度樓」。但張之洞害怕朝廷疑心，堅持將《晉書·劉弘傳》中「恢弘奧略，鎮綏南海」的「奧略」二字取為樓名，並親筆書寫了「奧略樓」三個字。

更讓毛澤東想不到的是，他一生都未曾見到過黃鶴樓。他曾於一九五三年從南京溯江而上，到達武昌後又登了一次蛇山，可他見到的依舊是奧略樓。兩年後，因要將毛澤東「沉沉一線穿南北」變為現實，打通京廣大動脈，這座樓被拆除了，武漢長江大橋從這裡經過。而黃鶴樓重建落成，是在毛澤東逝世九年後，但已非原址。後來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大多把詞名中的「登」字刪掉了。

五大結束後，毛澤東得知自己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但失去了曾擁有的關於農民問題的所  
有職務。

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設立了中央政治局，同時設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種組織制度從此在黨內延續。沒有比陳獨秀更適合的人選，蘇俄只能用他，陳獨秀得以第五次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但他在黨內的擁護者彭述之、羅亦農等被排斥在中央以外。

「沒有懸念。」毛澤東思忖著。他一方面密切注意黨內人士變化後的變化，似乎中央已經

是瞿秋白（提出了完整的新理論）、譚平山（與國民黨關係密切）、張國燾（算是中共的元老）在主持，這三個人的搭配上去年很完美，實際上他們彼此也暗中爭鬥。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參加各種會議，在農講所當先生。因為並不被俄國顧問們重視，他變得敏感而放任起來，往往在會議的中途才到會，並常常用高傲倔強的目光掃視會場，有時一言不發，有時發表一番鋒芒畢露的話語，然後揚長而去。當然，他的演說基本上都圍繞著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他堅持認為，農民渴望進到另一場革命，共產黨在循此方向領導他們的過程中絕不能退縮；中國革命不可能在城市知識分子或工人中發生，中國革命必然發生在農村。他用這些鮮明的觀點告訴當權者：他才是中國農民問題的專家。

中共五大沒討論毛澤東關於農村問題的提議，他只得轉而把希望寄託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身上，但最終，他依舊失望。

五月九日，毛澤東和鄧演達、譚平山等人聯名向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了〈土地委員會報告〉，並附上七個決議案。這個報告是根據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要求而寫的，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最後一次（第六次）擴大會上通過。

七個議案中，毛澤東執筆了《解決土地問題議案》。對譚延闓以「逆產處分委員會」名義分配土地的意見，毛澤東不贊成。他固執地認為應該成立「分配土地委員會」，並將這個委員會作為土地革命的辦事機構。

在議案中，他再次闡述了沒收土地兩步走的方法：先「政治沒收」，將土豪劣紳軍閥的土

地沒收，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後搞「經濟沒收」，即沒收那些自己不耕種而租給他人的田（多年後，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立刻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組織農民透過與地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成功地將沒收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然後通過「合作化運動」將全部土地收歸集體）。

在開會討論報告和決議案時，毛澤東敏感地發現，參加會議的陳獨秀、鮑羅廷對這個議案冷眼，但他沒理會、沒退縮，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

因為形勢與前兩個月不一樣了，這個報告與決議案已經比毛澤東當初的想法平和很多。報告指出：地主與佃農制度還不能完全消失，小地主及革命軍人的土地均應加以保障。這與毛澤東年初的「有土皆豪」的激進看法比起來理智許多。但他在決議中還是提出：大地主與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應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必須賦予農民政治權力等。

五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表決七個議案，十一位中執委參加了會議。七個決議中的《佃農保護法》、《處分遺產條例》通過了，剩下的《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法條例》等五個決議均被否決，尤其是針對毛澤東執筆的《解決土地問題議案》爭議激烈。舉手表決時，只有鄧演達、吳玉章、林祖涵贊成通過而不公布，其他八位均反對，他們是宋慶齡、汪精衛、徐謙、孫科、譚延闓、陳友仁、顧孟餘等。大家的觀點非常明確，認為如此解決土地問題，農村秩序將被擾亂，這把大火不會燒向敵人，卻可能燒向自己。

當天就要率總政治部工作人員離開武漢前往河南駐馬店北伐前線的鄧演達表決後說：這些

決議「因為客觀的環境不允許，公布了反而不好，對我們的政策有妨害」。

毛澤東關於農民問題的政治主張似乎到此戛然而止了。他痛苦地思索該怎麼辦？他當然不知道，僅僅九十多天後，武漢國民黨政府所有的立法、決議等行政文件都將成為廢紙。

剛坐完月子的楊開慧安慰毛澤東：「你應該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那是你親自調查得來的。」

毛澤東看看妻子認真地問：「你真的認為我是對的？」

楊開慧笑著指指毛澤東的衣服說：「關於中國的農民問題，我寧願相信穿灰布長衫的人，而不相信那些西裝革履的人。」

「哈！」毛澤東發出了響亮的笑聲。「霞姑你說得對呀。真理的掌握者只要稍稍留心就能看出來呀。舉目望去，除了彭湃，國共兩黨中還有誰比我毛潤之更了解農村農民呢？想在中國搞無產階級革命，現階段是句空話。上海的工人多，但又怎麼樣呢？蔣中正、白崇禧一天就用屠殺解決了問題，而湘、鄂、贛地區有幾個產業工人？都是農民嘛。」說到這兒，毛澤東點著菸深深吸了一口，慢慢說：「中國的農民只能做洪秀全，只能做李秀成呀！」

毛澤東的思索尚無頭緒，接下來發生的兩件事讓他無比震驚，根本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麼快、這麼猛，他聞到了濃濃的血腥味。

五月十三日，夏斗寅叛變；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叛變。這兩件事不但讓毛澤東震驚，陳獨秀、鮑羅廷等更是慌張得不知如何是好。

武漢國民黨政府宣布二次北伐後，非唐生智嫡系的國民革命軍獨立十四師在師長夏斗寅帶領下駐守宜昌，目的是監視阻滯已倒向南京的川軍楊森順江東下。可這位出生在湖北麻城、身體魁梧的軍人，卻趁武漢城內空虛倒戈了。他同意南京蔣介石的反共方案，從鄂籍紳商處獲取大量銀子後，竟裡應外合助楊森兵不血刃占領了宜昌。而自己卻趁機以兵力不足為由撤出戰場，回流至沙市，並與楊森約定，川軍止步宜昌，剩下的事由十四師完成（也有文獻稱，夏斗寅是真被楊森打敗後，才決定偷襲武漢的）。

十三日，夏斗寅到達嘉魚，並秘密殺害了十四師的政治工作人員，隨即發出了反共通電——元電，亮出進攻武漢的叛劍。

元電稱：共產黨人「盤踞要津，藉口容共，奪主喧賓，跨籍冒名，專橫肆恣，妄分左右，教唆農工，排除異己，傷天害理，循至無紳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騷然，哭聲載道，我兩湖人士受禍尤酷」。

夏斗寅是參加過武昌首義的老兵，他的突襲讓汪精衛大驚，武漢三鎮為之震動。汪精衛派夏斗寅的舊交湖北黃陂人任劍若等趕到嘉魚，試圖勸阻。夏斗寅為表示自己投靠南京的決心，竟

然殺了任劍若祭旗。

十七日，十四師第一旅的一個團攻到距武昌四十餘里的紙坊鎮，整個武漢在兵臨城下的氣氛之中開始流傳各種壞消息。留守武漢的第八軍軍長李品仙下令封鎖長江，使武漢三鎮變成三座獨立的城市。霎時，商店停業，有錢有身分的人避入租界，老百姓則向城外遷移、躲避戰火。

在一片驚慌失措中，城中的國共兩黨出現了短暫的團結一致。汪精衛、陳獨秀都明白失去了武漢意謂著什麼？鮑羅廷、羅易等人更知道，如果夏斗寅攻進了武漢，中國的政治格局將徹底改變，蘇俄近五年在中國苦心經營取得的成果將喪失殆盡。

當另一位衛戍武漢的將領葉挺找到張國燾表示可帶二十四師去阻擊夏斗寅時，得到了國共兩黨的一致同意，二十四師剛由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擴編成師。旋即，葉挺被任命為討夏前敵總指揮。

汪精衛想到了他在武漢可以調動的另一支軍事力量。一個月前，武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一週前，又決定將學校兩千四百名學員加上學兵團一千三百名學員編為中央獨立師，由侯連瀛任師長，共產黨人惲代英為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汪精衛決定派這支沒有作戰經驗的部隊上前線，同時命令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五百名學員編入中央獨立師，兩股力量均交由葉挺統一指揮。

討夏軍西征從十九日開始，奔赴前線的是二十四師兩個團和中央獨立師的一個團。中央獨立一師的學員平時訓練並不負重，結果上陣後亂成一團，身背子彈等物資時，連走路都困難。上

陣後槍聲一響，手中的槍便亂放一氣，竟然打傷了自己的長官，葉挺連斃數人才穩住局勢。結果西征一個半月後的六月三十日，中央獨立師被取消。

萬幸，葉挺部隊的指揮員多為黃埔軍校畢業生，且大多是共產黨員。他們經歷的槍林彈雨太多，還叫「葉挺獨立團」時就是北伐軍先鋒，人稱「鐵軍」。在北伐軍奪取武漢的戰鬥中，葉挺率部先奪汀泗橋，後戰賀勝橋，把一代名將孚威將軍吳佩孚打得無還手之力，葉挺也一戰成名。

更幸運的是，夏斗寅十四師所轄四小團的戰鬥力極弱。面對威名遠播的鐵軍，這支由夏斗寅老鄉親戚擔任部隊軍官的隊伍聞風喪膽，戰鬥僅進行了兩天，獨立師便作鳥獸散，分路南逃。

可就是這四十八小時，在武漢的兩黨要人都慌了神。漢口《民國日報》主編沈雁冰在午夜時分摸到瞿秋白家探聽消息，而瞿秋白正滿臉愁容與陳公博喝著悶酒。三人不著邊際地聊著，慢慢地、不約而同地聊到了老頭子陳獨秀。沈雁冰搖頭說，陳認為《民國日報》辦得太紅了，工運、農運和婦女解放的東西太多。

他因為口吃說話總帶著「這個……樣子……」。瞿秋白聽了他慢慢說的話後，表示自己的意見與陳獨秀正好相反，認為紅得還不夠。

三人對酌到天明，直到傳來葉挺的捷報。

那兩天，毛澤東也夜不能寐，他擔心葉部與夏斗寅僵持不下。他不能想像萬一夏斗寅攻進武漢，會有什麼結果？此人從宜昌一路過來，不停地搗毀各地的黨部、工會、農會組織，殺了不少黨員。

夏斗寅被平定，汪精衛呼出一口氣，但在武漢的共產黨人這口氣還出不來。據粗略統計，僅湖北，已有四十三個縣的農民和農協組織被反撲報復，死的農民已達三千人以上。同時農民協會也愈發激進，發展到了農民殺農民的地步，理由是開大會不槍斃人，農民則不服從。

因為夏斗寅叛亂，武漢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劣。漢寧相互封鎖，武漢城內甚至出現了糧荒。十七日，英國駐漢領事牛敦離漢，宣布與武漢國民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係。

此時，位於紅巷十三號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內空空的，安靜得很。上課剛兩個月的八百多名學員都在戰鬥，除參加阻擊夏斗寅外，還有三百學員十四日去了麻城，以鎮壓在那裡發生的紅槍會所組織的叛亂。

毛澤東完全支持武漢政府的一切決定，並快速將農講習所學員組織起來開赴前線。當前方大捷消息傳來後，他才有時間研究十八日陳獨秀等發出的〈中國共產黨為夏斗寅叛變告民眾書〉，這個告民眾書實際上是駁斥夏斗寅元電的。

告民眾書為共產黨辯解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如果是破壞中等階級的，他便不用亦不能和中國國民黨合作，而且使自己的黨員留在國民黨內。」

「中國共產黨反對在鄉村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張沒有土地的軍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沒有反對革命行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權利，並得參加鄉村自治機關。」

「農民幼稚行為，特別在湖南使軍隊裡邊發生不安。」

「中國共產黨關於小地主的政綱已明白規定，農民幼稚的行為絕非共產黨的行為。」

雖然告民眾書也有為農民運動撐腰的語言，也有「無產階級將武裝起來枕戈以待，保障革命贊助國民政府實施國民黨的農民政綱」之類的話，但這些在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軟弱的表現。怎麼可以把湖南火熱的農民運動說成是「幼稚行為」？這將會給那些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多大的打擊呀！

尚未理出頭緒，便傳來三十五軍何健手下的獨立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突然襲擊了工人糾察隊、省黨部、省農協以及共產黨機關的消息。時間是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此次襲擊便被稱為「馬日事變」。就在頭天，葉挺剛剛擊潰夏斗寅的叛軍。

湖南是武漢政府除湖北外唯一可靠的後方，這裡同樣是毛澤東所寄予厚望的地方。他對這方土地的了解以及所賦予的希望，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他清楚，如果湖南出現大面積的攻擊農協，共產黨連想翻本的機會可能都不會有了。他心急如焚，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

關於「馬日事變」的醞釀、動機、發生等都很複雜，牽涉到唐生智以及他手下的幹將何健等人。但起因確實很簡單，唐生智的部隊九成來自湖南農村，當兵除吃糧外，還需寄錢回去養家，而湖南的農運因發展迅猛，又缺乏引導，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偏差。軍官家裡的土地財產被沒收，士兵們寄回家的幾塊銀元也被截扣沒收，農協領導寫個條子便可判處一個人的死刑。更可怕

的是，在部隊中還漸流傳開一個謊言：「在湖南要實行共產共妻了。」

發動事變的許克祥是湖南湘鄉縣人，跟毛澤東的母親是老鄉，他的獨立三十三團是五月十四日奉令從湘鄉和湘潭調到長沙的。其父許桂庭是當地豪紳，被農協批鬥，農會的梭鏢隊就紮在他家屋場中。許克祥公開在部下面前寫農會是「砍腦殼會」，揚言：「這些黑腳巴子搞到老子頭上來了，老子絕不會便宜他們的！」

事變前，許克祥說服屬下跟他一起行動的理由是：「我突然接到報告說，共黨大燒殺的暴動已決定在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實行。」情報是湖南省黨部委員王基永透露的，此人是共產黨員，還多次勸許克祥加入共產黨。

二十一日晚十一時，三十三團動手了。到二十二日，除國民黨機關外，還查封了七十多個共產黨在長沙的機構。長沙市戒嚴司令部命令：只要捉到工會、農會負責人，立即處死。

所幸的是，湖南省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郭亮、夏曦、勝代遠等逃脫，長沙市到處是通緝他們的布告。

隨即，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臨時辦公處成立，許克祥、周榮光、李殿臣、王東原、張敬被選為「臨時主席團主席」，並發表了一篇一千四百多字的通電，提出四項主張指出：「總期吻合先總理之主義，政府之命令，全省真正之民意，奉以驅馳，罔敢陵躐，群策群力，救黨救國。所望各級黨部、各民眾團體，同矢救國之熱忱，共除群之暴類。」

此刻，長沙城內謠言四起。大家都不知道夏斗寅已敗走，而是以為武漢已陷落，汪精衛已

出逃，鮑羅廷已被殺……

二十四日，湖南省救黨委員會成立。再往後，常德、湘潭、瀏陽、湘鄉、衡陽等二十餘縣相繼發生大屠殺，農會成員被殺的有五人以上。各地逃匿長沙的豪紳、地主紛紛拍手稱快，奉許克祥為「救世主」。他們返回家鄉，對農民開始變本加厲地迫害，湖南大部陷入白色恐怖。

武漢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得知「馬日事變」的消息後，分別做出決定，這個決定是在確認唐生智不贊成許克祥的行動後做出的。

國民政府根據唐生智的建議，派譚平山、陳公博、彭澤湘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鰲山、鄧紹汾五人為特派員，組成赴湘特別委員會，以慰問軍民的名義去長沙。汪精衛特意囑咐他們：「制止軍隊與制止農會要同時進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則開會決定，派瞿秋白、張國燾赴湖南了解情況、指導工作。但鮑羅廷提議，由他會同赴湘特別委員會的代表前往長沙，以期用和平辦法解決問題。行前，鮑羅廷大發雷霆說，要逮捕共產黨在湖南的特派員李維漢，指責是他把湖南的局勢弄糟了。共產國際為了湖南的農運，已經花了五位數的銀元啊，現在卻沒有任何成果。

毛澤東得知「鮑羅廷顧問親往湖南調查長沙事件」後，二十六日聯同中華全國總工會，以總工會與全國農民協會的名義電告湘潭、湘鄉縣農辦，並要他們轉告省農協和省總工會：「政府已派五委員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理長沙事變，本日晨起程。望轉告全省工友農靜候政府解決，避

免衝突。」

在毛澤東看來，只要鮑羅廷出現在長沙，此前的謠言便不攻而破。接著他看到了由羅易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對「馬日事變」的決議：〈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

「湖南工農運動所引起的糾紛，會形成全部政局上很嚴重的問題。糾紛之起因，一方面是由於蔣介石叛變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湘籍軍官在內）的勢力及宣傳動搖了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一方面是由於貧農幼稚行動，如均分土地、均分財產、對於土豪之逮捕罰款以及關於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尤其是軍人之劇烈反對。」

毛澤東注意到決議的最後一句話：「以政府形式，繼續深入農民反對土豪劣紳之鬥爭。」他心道：什麼叫「以政府形式」？現在的當權派們會讓農協變成政府嗎？把這麼一起重大的屠殺事件說成是「糾紛」，是何道理？湖南的情況到底如何？

僅過了一天便傳來消息，鮑羅廷等人只到了岳陽，就退回武漢了。當時駐紮在岳陽的部隊有兩個團，團長分別是周盤和彭德懷。許克祥密電兩團長，要他們把赴湘特別委員會的鮑羅廷、譚平山、陳公博、彭澤湘就地槍決，所以鮑羅廷等趕忙逃回武漢。多年後，人們才知道，是早就想加入共產黨的彭德懷告知了鮑羅廷等人這個危險的訊息。

陸續有來自湖南的農協幹部到達武漢，毛澤東在都府堤四十一號不斷接待這些湖南老鄉。隨著信息的匯聚，他愈發感到形勢嚴峻，也感到導致此次事變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農民運動需要

總結，但現在誰能拿出好的辦法？湖南的工作該如何開展？

焦急中又傳來消息，中共湖南省委還在工作。在湘潭，他們組織了湖南工農義勇軍，省農協秘書長柳直荀被推舉為湖南工農義勇軍總司令，還編了一段歌謠：「朝打鐵，晚打鐵，快打梭鏢送農協。梭鏢亮堂堂，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

據說湘鄉、寧鄉、醴陵、株洲、衡山都動起來了。五月二十三日，省委還以湘潭縣黨部、縣農會、總工會、學聯會、女聯會、教聯會的名義給全省各縣農協、縣黨部發電報，發出號召：「反動派日伏省垣，乘我不備，於前晚攻擊工農團體，解散省黨部，慘殺工人領袖四十餘人。務望各方集中一切實力，採取聯合戰線，於電到時向長沙出發，以期恢復省垣原狀，而資鎮壓。」

長沙郊外的戰鬥持續了幾天，號稱「十萬農軍」的義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長沙而來。但缺槍少彈的農軍與許克祥的正規軍相遇，結果可想而知。正在此時，各路農軍得到命令不准圍攻長沙，一律撤回本鄉。已在戰鬥和還在來長沙路上的農軍接到命令後一哄而散。「十萬農軍悲壯圍長沙」，以失敗告終。在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上，卻天天都傳來殺害共產黨人的槍聲。

但也有文獻指出，十萬農軍回長沙只是個計畫，還沒有實施就被中共湖南省委取消了。長沙郊外只發生了小範圍的零星戰鬥，參加戰鬥的是未接到取消圍攻長沙通知的瀏陽農軍，他們只有幾十把舊槍，失敗是肯定的。

一年後，柳直荀在〈馬日事變的回憶〉一文中說：「但是當時的共產黨雖則組織尚好，但只是一個太平時代的黨，沒有鬥爭經驗，不能應付這個鬥爭環境，而只是一個反攻，不知事變將

至，採取積極進攻計畫。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腳亂，一切計畫全歸失敗。」

鑑於中共湖南省委黨組織遭嚴重破壞，毛澤東給中央寫信，請求去湖南工作。他認為，在此關鍵時刻，必須盡快制止大批農民脫離農會的狀況。他清楚，湖南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已掌握在地下幫會組織「哥老會」手上，他們完全不聽指揮，只按自己的方式處理問題，但在毛澤東眼裡，這些人依舊是可以團結的。但他的請求沒有得到中央批准。

當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說「本主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逼得人無路可走，也難怪許克祥他們要起來造反」時，毛澤東開始反思。尤其是他聽說汪精衛諷刺陳獨秀，「你們不是有十萬農軍嗎，怎麼連許克祥一個團也打不贏？」，而陳獨秀回答「湖南農運不是我們領導的，而是地痞哥老會的領導」後，心情萬分複雜。看來必須要審時度勢，考慮保存實力的問題了。

從五月三十日開始，毛澤東與鄧演達、譚平山、譚延闓等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向湘、鄂、贛三省農民協會發出訓令，要求各地農協在新形勢下必須採用新的政策，同時必須嚴厲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撥離間政策，力求與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家屬合作。

毛澤東覺得類似訓令還應該不斷往下發，同時應該發表通電，敦促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即撤職查辦，也是對唐生智的一個警告。

六月三日，這個通電發表了。同一天，毛澤東過江去漢口出席國民黨中常會第十四次擴大會議。因為此次會議重點是針對湖南問題的，毛澤東格外重視。

會議作出四項決議，毛澤東感興趣的是其中兩項，一是湖南省黨部及省農民協會省總工會均應改組；二是長沙、岳陽一切部隊歸三十五軍副軍長周瀾指揮。此人是二月二日晚與何健同時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的。何健為三十五軍軍長，周瀾為副軍長。

對周瀾其人，毛澤東兩週前還幫過他一個忙。「馬日事變」後，武漢的工農群眾對何健部隊十分反感，拒絕給正在河南打仗的部隊運糧食。周瀾找到毛澤東後，問題得到解決，他大為感動。毛澤東已暗下决心要回湖南去。他堅持認為，只有在那裡才可能把「槍、農民、馬克思主義」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找到實現理想的機會。如果周瀾在湖南，恐怕對各方面都會有好處。

毛澤東萬沒有料到，正是這個周瀾，到長沙上任後立馬開始「清鄉」運動，各地農會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湖南全境陷入了革命低潮。而「馬日事變」的魁首許克祥，則安全地移師湘潭。

三日晚，回到都府堤四十一號的毛澤東，見楊開慧、周文楠與孫嫂一起泡米包粽子，恍然道：「光陰似箭，又到端午了，該划龍船了。」他抱起岸英問：「喜不喜歡吃粽子啊？」岸英點頭說：「喜歡。」毛澤東笑著說：「爸爸也喜歡。」說這話時，他腦海浮現屈子的詩：「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對岸英說：「爸爸教你兩句詩，『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楊開慧在一邊笑道：「你讓岸英讀〈離騷〉，他能懂嗎？」

毛澤東說：「不懂不要緊，長大就會懂了。來，跟爸爸一句一句念。」

四十多年後，毛澤東寫過一首〈悼屈原〉的詩：「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未有殺人刀。艾蕭太甚椒蘭少，一躍衝向萬里滔。」對屈原的認識，已遠超四十年前。

關於這首詩，有人認為第二句應為「手中握有殺人刀」。在毛澤東心裡「殺人刀」是可以出政權的。他苦心期待的湖南農運此刻已面臨滅頂之災，就是手中無「殺人刀」啊。毛澤東在等待手握「殺人刀」的機會出現。

